

從《淺水灣》到《大會堂》

劉以鬯



劉以鬯

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1

先解釋一下題目：《淺水灣》與《大會堂》是我在香港編的兩種副刊。說是兩種，其實並不準確。我用這兩個名字編的副刊，共有四種：

(一)《香港時報》創刊時，我為該報編的副刊，名叫《淺水灣》。

(二)一九五七年秋，我從新加坡返回香港，《香港時報》編輯部高級工作人員走來找我，要我重入該報編副刊。編了一個時期，報館當局因銷路不前決定改版，要我兼編《淺水灣》。

(三)我接編後，將《淺水灣》逐漸改為

2

文學副刊，曲高和寡，只維持了一年，報館當局決定將《淺水灣》改為綜合性副刊。到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我除了編小說版之外，兼編娛樂版。我給娛樂版取名為《大會堂》。

(四)一九八一年秋，《星島晚報》決定增加一個純文學周刊，找我編輯。我給這個周刊也取名為《大會堂》。

此次文學座談會的主題是：「香港文學與通俗文化」，我願意趁此就雅與俗的問題談談在香港編輯副刊的經驗。講題中的《淺水灣》與《大會堂》，含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指我在香港編了三十多年副刊；另一方面指我為香港報紙編的兩個純文學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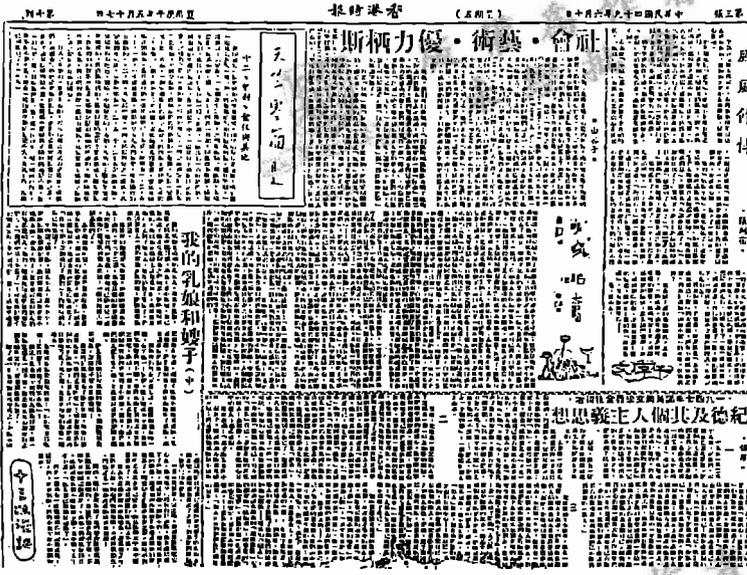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冬，我從上海來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香港時報》創刊，我是該報副刊《淺水灣》的編輯。從那時起，到一九九一年四月四日《星島晚報·大會堂》停刊止，我在香港編了三十多年副刊。

香港是個商業社會，大部分報紙（包括少數不是站在純商業立場辦的報紙），為了穩固經濟基礎，都會在副刊裏刊登大量庸俗的、趣味低級的、消閑的東西，藉以爭取讀者、刺激報份。在報紙老闆或老總的心目中，黃色文字、武俠小說、港式

鴛鴦蝴蝶派小說、連環圖畫之類的東西，是多數讀者喜歡看的。我初到香港時，不但那些在上午出版的「晚報」都走媚俗路線，甚至大報的副刊也顯現迎合社會心理的傾向。這種副刊路線與我在國內編副刊時走的路線不一樣，我在戰時重慶編的《國民公報》、《掃蕩報》、《和平日報》副刊以及戰後編的上海《和平日報》副刊，都是文藝性較濃的副刊，只登嚴肅的作品，不登媚俗的消閑文章。因此，當我第一次為《香港時報》編《淺水灣》時，我

必須設法尋找並認識香港讀者的閱讀趣味。對於我，即使在版面刊登大量通俗（不是庸俗）的東西，也是原則的背棄。不過，我的運氣相當好，那幾家找我擔任副刊編輯的報館，都不期望我做「特級校對」。他們祇給我一個原則，諸如「走通俗路線，不刊庸俗的東西」之類，却不剝奪我的選擇權。我可以在權力範圍內將少量的嚴肅文學作品「擠」入版面，讓嚴肅的文學工作者能夠得到活動的空間。

邊故事》、《酒色財氣》、《說黃道黑》……之類的文字商品中，「擠」入易君左的《意園隨筆》、陳映真的《萬商帝君》、梁錫華的《獨立蒼茫》、也斯的《我之試寫室》與《書與街道》、西西的《候鳥》與《我城》以及呂壽琨、司馬長風、董橋、戴天、施叔青、吳煦斌、李維陵、黃維樑、溫健騮、陳韻文等的文章。這樣做，不是想將純文學作品當作味精，而是不願見到純文學在這個商業社會裏失去生存的條件。問題是：香港辦報人多數重視經濟效益，對耕種的工作都不感到興趣，報紙銷量不跌，他們還不會「干預」副刊編輯的工作；銷量下跌，他們就會失去耐心。我在《快報》編了二十五年副刊，曾多次受到「干擾」。譬如，梁錫華的長篇小說《獨立蒼茫》在《快報》副刊連載時，快報編輯部的高級工作人員一次又一次打電話給我，用刺耳的聲調問：「《獨立蒼茫》還有多少？」或「《獨立蒼茫》什麼時候登完？」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我總是含糊糊糊答：「快了。快了。」後來，梁錫華有意將《頭上一片雲》交給《快報》發表，我不能不婉言拒絕。事實上，報館方面對嚴肅的文學作品是不喜歡的，就我記憶所及，「腰斬」的事情也曾發生過一次。那是一位從日本回來的年輕人，拿了一篇關於郁達夫的文章給我，因為字數相當多，需要連載一個時期。可是文章沒有登完，編輯部負責人就要我即刻給一個新加入《快報》工作的編輯在副刊寫稿，並指定要腰斬這篇寫郁達夫的文章。在這種情形下，除非我決定辭職，否則就要



《淺水灣》文藝副刊

作為一個香港報紙的副刊編輯，我常常有一種感覺：純文學在文字商品形成的大海中，猶如一艘小船，隨時會在驚浪駭濤裏傾覆。我在香港編了三十多年副刊，儘管報館當局都定下「用商品文字去爭取小市民層」的方針，我總會固執地刊登一些嚴肅的、有文學價值的、有藝術感染力的作品。我曾在《荒唐儒俠傳》、《玩家回憶錄》、《命理信箱》、《塵海風花錄》、《洋場金粉錄》、《少爺經理日記》、《實用驗方》、《性生活談奇》、《賽馬內幕》、《發達經驗談》、《馬迷的床

第六十期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九日 星期三 新加坡 叻報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九日 星期一

紅 新 興 進 報

給「蕭紅傳」的幾點陋見 杜安

追憶蕭紅 蕭紅

大會堂 出刊三期星每




《大會堂》文藝周刊

在同事間的「閑言碎語」，一直採取「此耳入那耳出」的態度，做我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我有一個固執的想法：一個可以全權處理稿件的副刊編輯，無論壓力怎樣大，也不能讓低級趣味的文字商品將嚴肅文學沖掉。我在香港編了三十多年副刊，一直在做「擠」的工作：將嚴肅文學「擠」入文字商品中。香港出版家認定嚴肅文學作品是「毒藥」，其實真正有毒的，是那些很受讀者歡迎的文字商品。

要我兼編《淺水灣》，希望我能給這個副刊換一副面貌，另闢蹊徑，使讀者感到新鮮。為了滿足報館的要求，我將《淺水灣》逐漸改為純文學副刊，每天劃版樣。劃版樣是一種控制版面的技術，沒有一個好的副刊編輯不懂得控制版面。不過，香港報紙副刊的版式都是固定的，往往要隔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改版，有的甚至幾年不變。這種編法，雖然已被香港讀者接受，我却一直認定劃版樣可以建立新形式，倘能加上新內容，就可使讀者得到新印象。

改版後的《淺水灣》，無論內容與版面都與一般香港報紙的副刊不同，不但得到本港嚴肅文學工作者的支持，也經常收到台灣嚴肅文學工作者寄來的稿子，雖不叫座，却產生了相當好的影響。不過，這樣的副刊，無論用多少時間與精力去編，總是無法刺激報份上升的。報館負責人非常現實，報份不上升，就要改。因此，這個純文學副刊只維持了一年，報館當局決定將《淺水灣》的內容改為知識性；我則除了小說版之外，兼編娛樂版。我接編娛樂版後，不願走一般娛樂版的路線，盡量少登「嬉稿」。這個娛樂版，名叫《大會堂》，與我後來為《星島晚報》編的文學周刊同名。

給娛樂版取名為《大會堂》，因為中間的大會堂經常提供健康的文娛活動，兩者具有相似的意義與目的。後來，我將《星島晚報》的文藝副刊也命名《大會堂》，因為我主張在這個副刊裏發表沒有立場和立場完全不同的作家的作品，讓「大」

照做。可是：那位年輕人對報館裏的情形並不熟悉，以為腰斬是我的意思，對我非常不滿，借訪問為名，走去見大老闆，告了我一狀。其實，我將這一類屬於純文學範圍的文章「擠」入版面，根本是違反報館當局所定的方針的。報館當局規定副刊走「通俗」路線，我為了嚴肅的文學不被商品大潮沖掉，總是將一些具有價值的嚴肅文學作品「擠」入副刊，完全不考慮事情可能引起的後果。也斯寫的專欄、西西寫的小說、施叔青寫的專欄，在《快報》副刊發表時，也常常被報館中人指為「難懂」或「不為讀者所喜」。我對那些流傳

3 談過三十多年來在香港編輯副刊的經驗，就該談談我在香港編輯文學副刊的經歷。

我在香港編的文學副刊有兩個：一個是《淺水灣》；一個是《大會堂》。

純文學在香港，因為沒有商業價值，不但不被大部分讀者接受，也不受文化商人重視。所以，香港報紙雖多，闢有純文學副刊的，很少。三十年前，我在《香港時報》編副刊，由於銷數下跌，報館方面

家聚「會」——「堂」。

我為《星島晚報》編的《大會堂》，是周刊，比在《香港時報》編文學副刊時所受的壓力小得多，維持了九年半。在這九年半中，雖然報館給我的「待遇」很差，我却一直認真地、用功地、費力地組稿、審稿、發稿、劃版樣、看大版，向會計部報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地址、身分證號碼與電話號碼等，不為別的，只希望能夠為嚴肅的文學工作者保留一塊活動的空間。

《大會堂》與我在六十年代初期編的《淺水灣》，雖然都是文學副刊，內容却有顯著的不同。《淺水灣》較着重現代文學的介紹；《大會堂》的範圍則寬得多。此外，兩個副刊的作家面也有相當大的差別。《淺水灣》是《香港時報》的副刊，只能容納右派和無黨無派作家所寫的作品，雖然刊登了不少台灣作家的來稿，作家面不算廣。《大會堂》不同，我一開始就定下「大家會聚一堂」的原則：採用了一中、左、右」與「老、中、青」的稿子。

為了編好這個名叫《大會堂》的文藝周刊，我廣邀本港與各地著名作家為《大會堂》撰稿。這些年來，一直保持着純文學副刊應有的水準。我以為報館當局會贊同這種做法的，但事實證明我的想法太天真。今年三月中旬，報館方面忽然來信通知我：「《大會堂》四月起暫停，感謝閣下過去對該版投下莫大的力，亦在星晚副刊史上增添光彩。」

起先，報館方面的決定使我無法理解。後來，讀了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星

島晚報·星象版》慧根所寫的《犧牲品》，才找到了疑問的解答。慧根說：

「嚴肅文學像陽春白雪，為小眾服務，市場有限，在商品求促銷的角度而言，它肯定未能叫座，只好被犧牲或腰斬……」

這就是雅與俗的衝突，也是今天這個座談會的主題。九年半之前，《星島晚報》要我為他們編輯一個純文學周刊時，他們當然也知道「嚴肅文學，為小眾服務」，「肯定未能叫座」。事實上，我在編輯純文學副刊時，是只求「叫好」、不考慮「叫座」的。嚴肅文學對人類思想有很大的影響，是每一個文學愛好者都知道的。因此，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星島晚報·星象版》中，有一位名叫「倍思」的作者談論《大會堂》停刊的事時，坦率表達了與慧根不同的看法。倍思說：

「一個文學園地，不知道會去到那年那個人身邊，不是一時可以說清楚的。我想說的是：它不是應犧牲的。無奈與同情也是不必要的。」

倍思講得一點也不錯，《大會堂》是不應犧牲的。現在，《大會堂》既已被犧牲了，有心人或嚴肅文學愛好者不妨考慮一下陳德錦的建議。陳德錦在四月十三日《快報》副刊中發表的《關於《大會堂》》一文中說：

「筆者衷心期望有人能搜羅所有刊出過的《大會堂》，做一個目錄也好，製成微型軟片也好，為香港文學保存一份豐厚的財產。」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